

王安石

传

锐意改革『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梁启超 著
杜婷 孙拓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梁启超



杜婷 孙拓 / 译

王安石传

Wang An Shi Zhuan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4年·沈阳

© 梁启超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安石传 / 梁启超著; 杜婷, 孙拓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2
ISBN 978-7-5470-2938-1

I. ①王… II. ①梁… ②杜… ③孙… III. ①王安石
(1021~1086) — 传记 IV. ①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971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320千字

印张: 20

出版时间: 2014年2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封面设计: 范 娇

版式设计: 范 娇

责任校对: 赵晓云

ISBN 978-7-5470-2938-1

定 价: 2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目 录

例 言	001
第一章 叙 论	003
第二章 王安石的时代（上）	015
第三章 王安石的时代（下）	025
第四章 王安石小传	037
第五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041
第六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051
第七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059
第八章 王安石与宋神宗	091
第九章 总论	
—— 王安石的政治方略（一）	097
第十章 民政与财政	
—— 王安石的政治方略（二）	101
第十一章 军队与国防	
——王安石的政治方略（三）	137
第十二章 教育和选举	
——王安石的政治方略（四）	167
第十三章 王安石的军事功绩	177
第十四章 罢官后的王安石	195

第十五章	新政的成绩	207
第十六章	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215
第十七章	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	235
第十八章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247
第十九章	王安石的家庭	269
第二十章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277
第二十一章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289
第二十二章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299

例 言

本书以阐述王安石的政治方略为首要目的，所以对他所创立的新法的内容和得失，都讲得非常详细，还将现代欧美的政治与它相比较，使读者对于新旧知识都能得以领会。

《宋史》中熙宁、元丰年间的记载，是南宋时期由史官写的，元代的人沿袭了这些说法，这些言论都是出自王安石的反对者之口，不足以使人相信。本书中对他们污蔑王安石的地方都一一详细分辨，列出“考异”若干条。

王安石不仅是中国的大政治家，还是中国的大文学家，因此对他的诗文抄录得比较多。分散在各章节中的，基本都与政治有关，那些只可作为文学楷模的，也摘录十几首放入最后两章，使读者能根据这些了解到他作品的全貌。

写稿时所参考的书籍百余种，取材最多的是蔡元凤先生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先生名上翔，乾嘉间人，他学问的渊博、文章的美好，都是近世罕见的，他所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共二十五卷，杂录两卷，成书时他已经是八十八岁

高龄，将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这上面。他的书流传得很少，而他这个人在士大夫们那里也没有什么名声，他是不是那种不求闻达的君子呢？于是在这里写上几句，以便让写史的人知道这位历史学家。

本书的写作信笔而成，没有反复检查，杂乱和错误之处，自知不会少，还希望海内学识渊博的人给予教诲。

著 者

第一章

叙 论

一位著名的中国史学家曾说：“想要了解一位历史人物，不仅要了解这个人的生活思想，还要了解他的时代背景，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看来，宋太傅王安石，道德涵养及胸怀气量如同数千顷的池塘一般，宽广阔大；志气节操仿佛数万仞的崖壁一般，崇高雄伟。治国方法汲取了全国各地的精粹，文章标志着散文的兴起，代表着精神的振奋。王安石筹划的政务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并且挽救了原有的社会弊端。一些比较优良的方法见解，大部分流传到现在仍没有被废除，即使是那些被废除的法制，也含有符合政治的些许因素，在其他国家被施行并取得了可观的效用。唉！像皋陶、夔、伊尹、周公等贤臣，在时间上离我们太遥远了，关于他们的逸事并不能得到详细的解说。如果想在夏商周三代以下寻觅一个完善的人，恐怕只有王安石一人可以胜任这个美名。在悠远绵长的千年历史中，可以拥有王安石这样的伟人，是国史的荣耀。人民应当买丝线绣像，或铸金像去祭祀他。数千年已经流逝，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世人是怎样评价这样一位伟人的呢？每当我读《宋史》的时候，不得不暂且把史书放到一边，内心苦楚，恸哭连连。

因为具有超凡突出的才能，却要蒙受世人的辱骂，即使时代变迁，也未能洗刷他一直以来所受的屈辱。在西方国家这样的人有克伦威尔，在我国有王安石。西方伪善浅陋的史学家这样评论克伦威尔，他们认为克伦威尔是乱臣贼子，认为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专制、伪善。这些说法万口同声流传了数百年，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造成了这坚固不可破的旧观念。直到现在才是非大白，一雪前耻。英国国会为先哲们画的画像有数百通，位于首位的便是克伦威尔。相对而言，我国的百姓对王安石又怎么样呢？一言众言，随波逐流，用丑言诋毁王安石。全与元祐、绍圣这两年并无差别。即使是有赞誉他的，也仅仅是欣赏他的文章，再进一步，则是认为他任人为政的勇气值得嘉奖。但是，对于王安石宏大的政治事业，却没有人能提及。他高尚的人格，更如良好的木材被埋在深矿当中，长久的劫难，不得发出光芒。每次读《宋史》时，都难过得不得不把书放在一边。

曾国藩作文曾说：“宋代的儒者对待小人的过错是宽恕的，然而对于君子的过错却是责备的。”唉！难道单单是宋代的儒者才这样吗？大概整个社会已经被深深地毒害了。迄今为止，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孟子厌恶为了求全而毁谤他人的做法。求全的人，必然要在本身就很优秀的事物中寻求不好的因素，可谓精益求精。但是还从来没有人忽视一个人的全部优点，反而虚构出他的缺陷，为的只是可以尽情地对他污蔑诋毁。如果说有，也是从宋代儒者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民，长久以来恪守着保守的本性，把稳定看成是最大的准则，对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大变革，人们先是感到惊骇而后试图阻止这些举措。这确实不足为奇，然而政见单纯是政见，人格单纯是人格。怎么可以因为在政见上有所分歧，就选择政见相同的人结成一党，而针对那些政见相异的人，便选择加以残害呢？无法战胜政见不同的大臣，就虚构出一些言论来污蔑他人的德行，这是村妇相互讥讽的伎俩，谁能料到这种低俗的伎俩竟然出现在贤士良臣之间。正是因为这种现象使得千百年来的世界成为一个黑白不分、不痛不痒的世界，使得正派伟岸的杰出人才不得独自生存在社会上，所有人戴着伪善的面孔相互欺骗、相互勉励。唉，每次读《宋史》的时候难免不把书本舍弃在一边，

独自落泪！

我今天想为王安石作传，但是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十分为难，就是不能完全相信《宋史》。不能完全相信《宋史》并不是我一人的见解，在我之前，古代其他贤士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些贤士的观点，对于王安石而言如空谷足音一般，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可以使天下人信服。如孟子所说，他们不会用话语来迎合自己喜好的人，现在将他们的语录抄录下来，看看是否有理可循。

陆象山先生（九渊）所作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宋仁宗当政的时候，王安石写《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奏皇帝，文中陈述了当时的实事，全面地剖析了社会存在的弊端，详尽有序，恰到好处。王安石以往所学的学问，过后进行的变法革新，没有不被纳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然而那些不与王安石为伍的人，有的人说他是为讨皇帝开心，有的人说他阿谀奉承，有的人说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有的人说他违背了自己所学的内容，这些人怎么可以说是了解王安石的人呢？雄才大略者具有独特的志向，不屑于沾染淫声女色、追求显达的恶习。耿介正直，任何世俗的东西都无法侵入其内心。王安石洁淨无瑕的节操，像冰霜一样凜然，这就是王安石的本质。力图扫除学术中鄙陋的地方，更改旧制度的因循守旧。治国之道一定要运用孔孟的学说，功勋与成绩一定要追赶伊尹和周公，这些便是王安石的雄心壮志。不期望他人能够洞察自己的志向，但是名声却愈加显赫，一时间他的地位超出朝中他人。王安石能够取得当时的地位，难道只是偶然吗？是因为仁宗在恰当的时候任用了他，这样贤明伟大的君主不是世代都可以出现的。他先向王安石学习而后将王安石纳为臣子，这样的皇帝无愧于商汤高宗。王安石能拥有这样的明君，为其所用，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关于颁布新法的提议，在朝廷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施行没有多久，天下的官员和百姓无不感到忧心忡忡。王安石坚持执行周礼，没有丝毫的疑虑，对自己的所学信心满满，没有任何的犹疑。君子力图争辩，然后相继离去；小人投机取巧，暗地里否定王安石的决策，表面假装迎合。忠诚朴实的人隐退了，奸险狡诈的人却如意。

王安石没有察觉这一切，是被这些伪善的人蒙蔽了。熙宁年间排挤王安石的人，大多数都是在暗地里诋毁他，而不是用情理来征服他。心平气和的人只占了一二成，而激进的人却占了八九成。这些人的言语对上未能取得皇帝的信任，对下未能动摇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反而坚定了他要变法的决心并且一步步地执行下去。变法中的祸患之处，应当由这些君子共同分担。元祐年间的大臣，做出的改变，难道就没有任何偏袒和成见吗？贵重的是玉本身，而玉石上的斑点并无法掩盖玉石的光芒。古代的史书，直接叙述历史事件，其中的是非善恶，没有不展现出来的，劝勉奖励鉴赏警戒的话语，被后世的人们所信赖。而褒贬掺杂个人的喜好，不忠诚于事实的本真，小人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难道这就是那些所谓的君子想要的结果吗？（中略）近代的学者，看法观点一致，在朝廷上的发言雷同，难道这就是善于学习的表现吗？王安石在世的时候居住在临川，被解除官职后移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旧居已经成为废墟，乡亲们向县里申请，在那块地上立了祠堂。绍兴初年的时候还经常修葺。距今已经接近四十年了，祠堂坍塌得十分厉害，路过的人无不对此表示哀叹。现在各路神怪的祠堂，绵绵不断拔地而起。然而王安石作为一代英才，拥有超脱俗世的节操、山川大地给予的灵气，世上再也等不出这样的人才了。他的祠堂却如此破败不堪，国人对他并不敬畏，难道不是舆论的不公导致的吗？人们对于王安石的畏惧与疑惑，竟然到了这样的田地！（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在《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清廉高洁，具有古人先端正自己而后治理国家的正大之气。王安石执政时，慨然立志，要把皇帝扶植成为明君，如同尧舜等那样上古三代的明君。他在任期间颁布了许多优良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等法令。后人也多模仿实施，即使是在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为也这些法令辩解，认为不能全部改变。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施行起来不够完善，容易滋生

弊端。然而人们曾考察过当时的势态吗？宋太宗在北征途中被流箭击中，两年后箭伤复发而亡。宋神宗谈到此事，总是伤心痛哭。西夏原本是宋臣，却称帝立宗，这是所有宋臣不共戴天的仇人。宋每年要向夏辽两国缴纳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用来庆贺、吊唁、出使、贿赂宠臣的费用每年成倍地增加，大宋如何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让夏辽等尊重大宋的君王，依靠什么来成就伟业呢？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臣民日夜不安的原因。然而宋想动用兵力但是兵源缺少，想要扩充兵源军饷却不足，王安石看到这番景象，怎么能够轻易妥协呢？就如同你的仇敌，戕害了你的父亲和兄弟，你急于与之争个是非曲直，怎么能够就这么算了呢？宋人苟且偷安已经这么多年了，听闻北边有大风吹来就会瑟瑟发抖。对待王安石却可以一齐攻击，故意为难他，污蔑说王安石是奸贼，并不主张与王安石商讨，也不考虑他是否会有什么大计策，单单只是想使王安石一事无成后将他驱除朝廷。然而他们指责王安石太过执拗是合情理的吗？况且王安石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显著。任用薛向、张商英治理国家政事，任用王韶、熊本等管理军队，向西歼灭了吐蕃，在南面平息了洞蛮，夺取夏人五十二个寨子，高丽来到宋朝朝拜，大宋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非要想办法破坏阻挠这一切，难道王安石就应该时刻记挂着君主的仇敌，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就可以对此置之不理了吗？他们斥责王安石的话就更加可笑！他们认为导致敌人对宋起疑有七点原因：一、鼓励高丽朝贡大宋。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路。三、在西部山区种植榆树、柳树来阻挡吐蕃骑兵。四、创立保甲制度。五、在河北地区建立城池。六、建立都作院，研制新式的军用武器。七、在河北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主张这七项措施应该马上停止来解除敌人的疑虑。唉！敌人不欢喜我们有所戒备就解除戒备，敌人看我们的将领不欢喜难道还要杀掉我们的将领吗？这也是韩琦掉脑袋的原因吧！这七件事是王安石施行的主要政策，但《宋史》中只记录了一少半，大部分被省略不写。幸亏韩琦将这些误以为是王安石的罪状，并且记录下来流传到了后世。其他对王安石的功绩熟视无睹的人还有很多，范祖禹、黄庭坚作《神宗实录》目的在于诋毁王安石。陆佃说：“这是诋毁他

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了这本书。元祐年间，过往反对诋毁王安石的党派重新执政，又把书改成原来的样子。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当中指责王安石的话语是对是错？即使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争辩，可恨那些斥责王安石的人，这些人将国君受他国侮辱、国家破灭的仇恨算在王安石身上。后世的人们把苟且偷安、委靡享乐的人当成君子看待，把建功立业、振兴国家的人当作小人看待，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王安石个人的不幸，还是整个大宋的不幸啊！

到了近代，江西金溪的蔡元凤先生（上翔），竭尽一生的心力，为王安石作了本《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期望把好的名声留给后世，只要有善行就应该记录在历史上得到褒扬，作恶后就要剥夺他的名声，这些全部根据事实来做出判断。但是后世对他们的生命历程各抒己见，褒贬不一，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是不会因为主观而改变的。只有对王安石的评价并不是忠于事实的，王安石逝世距离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起初大肆诋毁王安石的文章，多是个人论述，之后人们将这些个人的论述记载到《宋史》中，并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想去辨别这些言论的真伪就越发的难了。（中略）王安石有《答韶州张殿丞书》，上面写道：“自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之后，每个国家开始记录各国的历史，而记录历史的史官，多是在一个家族内部世代相继，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公正而牺牲掉宝贵的性命，不辜负身为史官的职责，流传下来的历史，全部是有所根据的。以后诸侯不再有史录记载，现在若不是拥有爵位的身世显赫的人，即使你雄豪刚烈，道德行为受人赞赏，但是如果没有被朝廷所称赞的话，也是不能被写入历史的。而且执笔写史的人不单单只是世代相传的史官，也成为了当时的权贵。这些史官观看大臣们在朝廷中商讨国事、各抒己见，个人对朝廷中的人褒贬不一，有时把忠臣当成是奸邪的臣子，把异类当成是同党。有人当面斥责他也不觉得害怕，在背后讽刺他也不觉得羞耻，只要能满足他那判定好恶的心就好。况且还

有的执笔者违背事实，来裁断前人的善恶，不辨是非，附和着别人的喜好来评价他人的善恶，或者是赞扬，或者是诋毁。死去的人不能质疑他们评判的对错，在世的人也不能和他们探讨事情的真伪。奖赏、惩罚、诽谤、称赞，也不能在这期间进行，只是以这样的一己之见，怎么能够使冥界的人相信呢。”唉！这说得真是太详尽了，这本书是在庆历皇祐之间写的，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贤士文豪中成名了。当时还没有非要诋毁他的人，然而读到这本书，不禁感到唏嘘感叹，为什么王安石会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自己被他人诋毁诽谤的命运？自古以来前代的历史记载，必然是由后代的人来修写他们的历史。他们写史的依据，必然有一定的来源。如果说为宋人编史的是元代的人，不得不说元代的人总是把私人的论著纳入到正史当中。当熙宁年间王安石主张的新法刚刚实行的时候，朝廷里的议论就蜂拥而至。事实上这部新法确实有缺点，可以指摘的就有好多处。等到元祐年间，那些曾反对王安石的大臣执政时，不但废除了新法，而且谋害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同党。尤其是在范祖禹、吕大防等人起初修订《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的《东轩笔录》，都已经陆续问世了。全部都是那种含沙射影的文字，目的就是宣泄自己的愤慨之情，满足自己的那一点善恶之心。随后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过去感慨道：已经入土的人无法与写史的人争辩是非对错，活着的人也无法与他们评论事情的曲直。这些感慨仿佛被后人重新感受到了，不料这样的遭遇降到王安石身上。这些写史的人把一切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于认为宋朝灭亡是王安石一人的过错，难道不觉得过分吗？从南宋到元朝，中间距离二百多年，大肆诋毁王安石的人，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有像周德恭这样的人，认为宋神宗如同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些亡国之君的合体。有像杨用修那样的人，斥责王安石是伯鲦、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些谋位夺权的人的合体，这些污蔑的言语比以往更加过分。又如之前的苏子瞻作的《温国行状》的文章，共有九千四百多字，诋毁王安石的语言占了一多半。不用说自古以来就没

有这样的文章，苏子瞻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又有明朝的唐应德，作有《历代史纂左编》，其中关于王安石的文章有二万六千五百多字，其中没有记录任何一句美好的言语，一点值得赞美的行为。这些可以称为可以信得过的言论吗？（后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之士，他们的言语是应该可以相信的。而且蔡元凤先生是个博览群书的有识之士，苦熬了数十年的时间，尽力收集关于王安石的数千卷的资料，著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同前两者表示同样的看法。然而现在的人们想要为王安石写书立传，想要做到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的话，不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吗？历史上难见一二的圣人，不但其创立的盛世伟业没有在历史上得到彰显，还被所有人指责诟骂，与禹鼎被人认为不祥的遭遇没什么不同。天下不再有是非曲直，这样的祸事对于世道人心的冲撞，就如同洪水猛兽一样猛烈。想要辟除邪论、抵抗谣言，发扬高尚的德行，使这种德行光辉熠熠。向上无愧于先人的期望，向下为后辈的有识之士带来益处。这样的事做起来很难，这也是我写这部书的初衷。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多史书当中，《宋史》算得上是最污秽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中写道：

“作《宋史》最大的目的便是宣扬迂腐不化的道学，其他的事都没有受到重视，所以错误的地方很多，难以统计。”清代著名学者檀萃说：“《宋史》冗杂鄙陋的地方十分严重，是非曲直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自从有了洛党与蜀党的分立，到南渡之后二者的争辩也没有平息。这种由于派别不同而产生的偏见，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心，因此对同党派的人的掩护过多，对其他党派的人指责过多。”这段话可以说是明确地指出了《宋史》的病根。在这以后的柯维骐作了《宋史新编》，沈世泊作《宋史就正编》，当中均有纠正《宋史》病处的内容。《四库全书提要》将《宋史》中有问

题的地方摘录了下来，其中包括志和纪相互矛盾的地方、列传前后矛盾的地方十多条；赵翼作《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在《宋史》中摘录了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冲突处，各十多条，各传中庇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判断不适当处、是非不分谬误处共一百多条；由此看出这本书的价值，也不过如此罢了。然而其中错谬最严重的地方，便是几百年来并没有人来纠正的《宋史》中的错误，即《宋史》中关于王安石内容的记载。

《宋史》是由元代的人完成的，他们对宋代的历史并没有什么个人的成见，只是没有什么知识，不能恰当地选择史料，辨别史料的真伪。所以想要辨别《宋史》内容的真伪，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据史料的真伪。宋代著有《神宗实录》，对《宋史》的真伪争辩最为严重，几次有人因此被送进大狱。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几人共同作《宋史》时，陆佃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不休。黄庭坚对陆佃说：“依您看来，《神宗实录》就是一部虚假的历史吗？”陆佃反击说：“就如您说的，《宋史》就是诽谤他人的历史了吗？”虽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但是他并不赞成王安石制定的新法，然而现在他说这些话，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当中诋毁污蔑的言语很多。这些是发生在第一次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发生的事。到了宋哲宗登基的时候，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先后向皇帝上奏，指出实录院前前后后所著的《神宗实录》有问题，其中很多内容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真凭实据，许多牵强附会奸恶的言语，诋毁宋神宗以来的政事。除此之外，国史院采用的由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提供的史料，也没有历史凭据，只是从他人那里听到的传闻。皇帝说：“文字已经阅读完了。史官竟敢如此放荡傲慢不敬地对待写史的职务。”章惇说：“不只是从传闻中得到写史的材料，即使是从官僚家中取得的材料也不足为信。但是用从传闻那里得来的材料作史，这造假欺诈的胆子实属太大了。”安燾说：“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史官，出现这类史官，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是由元祐年间那些反对废除新法的人说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信的。在这之前蒋之奇以家庭内部淫乱的罪过来弹劾欧阳修，欧阳修每每上奏希望能查明事

情的真相。直到宋神宗质问蒋之齐事情的原委时，蒋之奇也只是用传闻来搪塞，这样才得以了结这一事端。可见宋代朝廷内部的习气，也不过如此而已。于是皇帝命令蔡卞等重新修著《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作的《熙宁日记》进献给皇帝，因此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的错误纰漏之处被修改了，因为全部是用朱笔修改的，所以又称为朱墨本。这也是第二次修著的《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的人们还是不停地攻击朱墨本。宋徽宗当政的时候，刘正夫等人认为元祐、绍圣年间所作的两本《神宗实录》各有长处短处，应当将二者互相综合，才能把这《神宗实录》相传万代。对于此事，徐勣等人认为，《神宗实录》已经修改五年了，也没有完成，多是因为元祐绍圣年间的臣子们的喜好有异，范祖禹等人多以王安石的家藏记事为主要依据，蔡京兄弟等所依据的内容，便是史官按日对王安石的记录，各人为各人的依据争辩，所以议论纷纷，不得休止。当时在朝廷为官的人，家家均有家藏的记录。这样推断下来，王安石家里也必然有这样的记录。我认为应将王安石家中的记录全部取出来，判定是非，统一意见，最终著成《神宗实录》。于是又诏令重新编著《神宗实录》，还没有完成就赶上了北宋的靖康事变。南渡之后，绍兴四年，范冲又一次将改著后的《神宗实录》进献给宋高宗，这就是第三次编著的《神宗实录》。编纂《宋史》所依据的便是这个版本的《神宗实录》。从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历经三十多年，元祐年间的各个党派，不停地颠簸转换，留下了深深的怨恨。而且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了父亲的业绩，变本加厉地百般报复。然而王安石自己著的日记与绍兴年间重新修著的“朱墨本”已经在岁月的洗刷中毁灭殆尽，没有凭据可以用来考查第三次修著的《神宗实录》。所以《宋史》只能凭借一面之词，把范冲写的《神宗实录》当作可以相信的史料。这样一来，王安石所承受的冤屈便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永远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只要是《宋史》中诋毁污蔑王安石的内容，从其他的书中均可以得到考证，可以证明这些内容中很多属于污言秽语，占有百分之六七十。近代的儒者李绂、蔡上翔为了为王安石平反，发起了广博的论证，我将其中重要的内容摘录下来，分别置于下面的章节，在这里就不多说了。重要的是，